

大學學位值多少？ 衡量大學投資回報的不完美科學及爭議性計算法（下）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對科系和就業市場之間的關係感到困惑。學生和家長（坦白說，許多在大學工作的人以及媒體專家）傾向於將主修與職業劃上等號，並且他們難以看到，舉例來說從人文學科邁入職場的道路。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在美國社區調查的數據，銀率網 Bankrate 在它課程排名中列出了「最有價值到最沒價值的大學科系」，強化了一個簡單的公式：建築工程系（在 Bankrate 的列表中名列前茅），你可以作為一名建築工程師有一份賺錢的職業；主修作曲和演講、戲劇、美術或其他排名墊底的科系，誰知道你會做什麼—除了在社會底層掙扎之外。

這些排名可能會影響一些學生，或者它們可能會讓父母強迫他們的孩子去做一些更「實用」的事。但總歸來說，主修的選擇往往是看個人的想法。對戲劇或傳播有興趣的學生不太可能僅僅因為薪水更高而選擇主修建築工程或營造服務—如果學生真的做出了這種選擇，他們就不太可能在這方面感到快樂和有所成就。

學生可能不需要更多特定科系的經濟回報清單，而是幫助他們發揮自己的興趣和才能。科系的選擇通常基於學生一時的興致和（錯誤）觀念，並且通常不會因為他們獲得的建議和指導而被改變。試想一個學生拿著考慮中的幾個科系諮詢高中輔導老師、導師、或大學顧問的情況。

在大多情況下，「他們不會告訴你，『我認為最好的決定是 X，』」范德沃夫說。「他們會說，『哇！那些看起來像是很棒的選擇。祝你好運！』我們的國家就是沒有這類系統能幫你做選擇。」

如果做得好，學生和家長、政策推動者和大學將不會僅僅盯著哪些學科或科系的回報最好，以及如何鼓勵推動更多學生進入那些領域。相反的來說，他們會專注在幫助學生了解他們在選擇的學科中能學到的相關知識以及有用的技能。

但這需要溝通和投入，也許還需要對在諮商室和職業諮詢辦公室

工作的人提供更多支援。在某種程度上，通過數據來提供解答或造成壓力是更容易些的。

教育界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數據，我們認為如果收集更多的訊息，就可以發現和解決這個行業的許多問題。長久以來，學校受到一輪又一輪數據的控制，接著是來自數據的分級、評分和區分——無論是各種最綠化的大學名單，還是面臨財務壓力的大學的分析，亦或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排名，還有多家公司根據《克萊里法案 (Clery Act)》收集來的犯罪統計數據所發佈的「最安全校園」名單。就像學生說標準化的考試和成績不能準確衡量他們的特質一樣，學校經常抱怨數據收集有瑕疵，或者各種排名無法反映他們實際上提供的教育價值。

因此，為了填補這問題，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需要更多的統計數據來補漏洞。當然，根據他們的說法，更多的數據會讓他們更接近事實。但是然後呢？

「一旦開始收集數據，就很少會停止收集這些數據點。你只需要一直添加新數據即可」，非營利組織 TuitionFit 的總裁兼創始人馬克·索爾茲柏里 (Mark Salisbury) 說，該公司使用大學申請者的數據來幫助他們比較各大學之間的學雜費。學費數據的細微差別又提供了一個大學計分卡在研究上的潛在問題的例子——這些數據只涵蓋了申請了就學貸款的學生。

「科系越小，畢業生的人數就越少，而你所投資的則越容易沒有回報，極有可能是大量的沒有回報。」他說。而小科系往往是人文學科這類已經被行政管理人員和董事會盯上的靶心。「他們會看了這些報告並說，這就是我們解散哲學系的另一個原因。」

對於數據，總是存在數據如何改變人的行為的問題。在創立 TuitionFit 之前，索爾茲柏里曾任職於愛荷華大學 (University of Iowa) 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並曾在伊利諾州的奧古斯塔納學院 (Augustana College) 從事學術機構研究。他說學術機構研究一開始是與校長關係密切的職位，但卻在組織結構圖上逐漸地往下移動。索爾茲柏里認為，這反映出學校相比於這些數字的運算更加看重戰略規劃，但它也可能代表了學校內部忽視數據的路線。

「在過去 20 年裡，有多少次呼籲學校使用數據提供的訊息來幫

助制定決策？」索爾茲柏里說。「這說起來簡直太荒唐了。」現實情況是，當校長已經決定了推行某方面的決策時，那些學術研究員不會傻到在校長面前揮舞著相反的數據。索爾茲柏里說，曾經不乏有此類人因而被解僱。

他曾見過管理階層巧妙的捏造數據以使學校看起來更好——例如，誇大申請數量好讓大學看起來更具選擇性，或者聲稱有 90% 的畢業生都是在四年以內完成學業的。（如果說大學的四年畢業率為 70%，而其六年畢業率為 77%，那麼技術性上來說這樣的聲稱是正確的。）

「讓學校使用數據是對校園政治完全無知的人才會做的，」索爾茲柏里說，「因為權力結構決定了使用哪些數據以及如何使用數據。」

忽略那些不順眼使人不便的指標是一種問題。但另一種極端是，數據也可以成為優先「數據擷取」的助力，古德哈特定律總結了一個陷阱：「如果一項指標一旦變成了目標，它將不再是一個好指標了。」

教育工作者已經看到了「有教無類」（此處意指《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又譯為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其內容適用範圍為小學中學 1-12 年級）的效果，這是一項 2001 年的聯邦法律，該法律大幅擴大了學校的高風險測試，並將聯邦資金與結果綁定。家長們抱怨說，關注分數扭曲了學校在教育上需要優先考慮的事；教育改革者想知道以數據來推行政策是否使學校在教育責任和義務上做得更好。學校教師則抱怨說，他們花在評估和收集數據上的時間比實際教學的時間還要多。

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尼古拉斯·坦皮奧（Nicholas Tampio）預計高等教育即將迎來變化發展，數據將用於績效，然後這些指標將開始影響行為，例如藉由數據學生如何找到興趣或熱情、選擇研究領域以及參與到社會中。最近，他寫了一篇評論關於由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所推動用於追蹤大學畢業生個人財務成果的數據庫。

他說：「這就是我想要探討的，他們會為高等教育制定一個有教無類法案嗎？」他接著說，2021 年在兩黨支持下重新引入的《大學透明度法案》將是「這幅拼圖中關鍵的一片」。這法案將要求收集學生入學率和完成率等因素的數據，並允許美國教育部與國稅局和社會保險

局合作計算學生的財務成果。

「教育和政治哲學家從柏拉圖那裡意識到教育和政治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坦皮奧說。那麼政策制定者帶著大學版「有教無類」，其內容著重在財務信用分數而不是數學成績，他們想對大學生傳達什麼樣的訊息呢？

坦皮奧的結論是：「他們一直在傳遞同樣的訊息—讓生命變得有價值的就是金錢。」

撰稿人/譯稿人：Scott Carlson / 翁而真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1.10.18 What's a College Degree Worth? The imperfect science and contested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colleg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ats-a-college-degree-worth>

